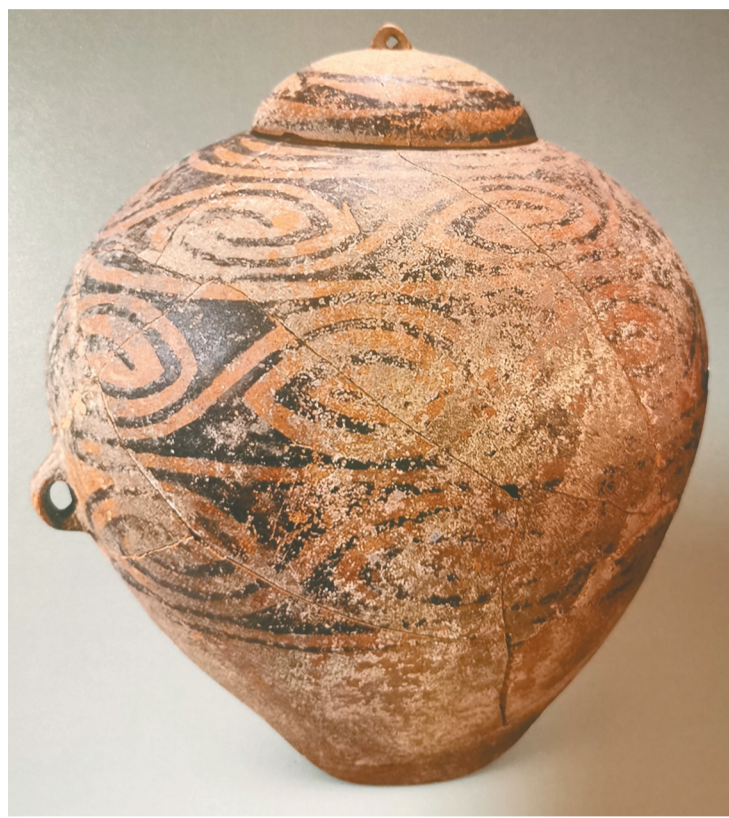


辽西走廊河西走廊都有一条“彩陶之路”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文并摄

访古寻踪

日前,“一带一路上的河西走廊”大型全媒体集中采访活动在甘肃省进行,河西走廊再次引起热议。与此同时,我省的“辽西走廊”也引起人们的关注。“河西”与“辽西”两条著名的交通要道,经贸、文化交流廊道,分居中国北方一西一东两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带盖彩陶瓮,红山文化器物,距今5000年,牛河梁出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距今5500年,甘肃省博物馆藏。

两地出土的彩陶有共同走向

千载风云激荡,万类霜天自由。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一横一纵,一西一东,相距2000多公里。作为国内两大著名文化交流通道,“河西”与“辽西”两大走廊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有着密切联系。河西走廊,因地处黄河以西而得名。这条长约1200公里的通道横卧在甘肃省西北部,呈西北-东南走向。辽西走廊,因穿越“古辽西”而得名。这条长约500公里的通道南起燕山,横穿医巫闾山,直抵辽河流域,呈西南-东北走向。虽然所处地理空间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但“河西”与“辽西”这两条承载了厚重历史印记的廊道,在几千年的时间迭代中熔铸了相同的文化底色——它们是经贸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廊道,也是民族交往交融的重要廊道。换言之,这两条历史廊道既是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包容性”的践行者,也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代表者。

若要站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节点上追溯溯源,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的最初互动和交流,与史前的“彩陶之路”有关,距今已有5000多年。甘肃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彩陶最为发达的地区。这些线条流畅、纹样别致、造型独特的彩陶,不仅是河西走廊数千年绵延不绝的独特文化风貌的体现,也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书写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河西走廊上的彩陶最早出现在8000年前,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国内其他地区彩陶没落后,这里的彩陶仍代代相承持续了5000年。甘肃省博物馆“彩陶艺术展”展厅沿着时间轴线陈列了各式彩陶,勾勒出一条不曾中断的“彩陶之路”,尤其是人头形器口彩陶瓶,是史前彩陶艺术珍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曾对河西走廊上的“彩陶之路”有过这样的论述:这条路是早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彩

陶之路”对中西方文明的互动、融汇、发展和兴盛都产生过非凡的影响。考古研究发现,距今约5500年,河西走廊上的彩陶受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与此同时,地处辽西走廊上的红山文化也同样受到了庙底沟类型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彩陶”上,“河西”与“辽西”以仰韶文化为交流点,有共同的走向,实证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红山文化专家郭大顺表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沿着辽西走廊北上,在辽西地区“开花结果”,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具有鲜明特点的彩陶,就是庙底沟类型北上的实证。实际上,辽西走廊上也曾有一条“彩陶之路”,就像河西走廊上的“彩陶之路”是“丝绸之路”前身一样,辽西走廊上的“彩陶之路”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前身,而这条“草原丝绸之路”,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沟通欧亚的商贸通道。

慕容氏从辽西迁至河西走廊附近

如果说史前时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河西”与“辽西”走廊的彩陶注入了同一个文化基因,那么,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的关联又进一步密切,因为它们面对同一个族群侵袭:匈奴。2000多年前,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此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上设置了“河西四郡”,支撑起贯穿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与此同时,汉武帝在辽河以东地区设置了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被称为“汉四郡”。辽西走廊是连接中原地区和“汉四郡”的重要通道。“河西四郡”和“汉四郡”设置的过程,也是西汉王朝与匈奴对决中不断获胜的过程。汉武帝在河西走廊“断匈奴右臂”,在辽西走廊一带又“断匈奴左臂”,匈奴势力衰弱。就这样,西汉王朝既保证了边疆安全,又保证了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的顺畅。

在此过程中,不得不提一位西汉名将,他就是被称为“飞将军”的李广。李广骁勇善战,有勇有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代诗人王昌龄诗中的“飞将”指的就是李广。“龙城”则是指右北平郡,其位于辽西走廊上,西汉时期,李广曾任右北平郡太守。后来,随着西汉与匈奴战事发展,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广又从东北向西进军,参加了“漠北之战”。最终,西汉取得胜利,加速了我国北部地区进一步的统一和开发,可谓意义深远。如果说两汉时期,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是共同打击匈奴的前沿一线,那么,此后的东晋十六国时期,这两条历史廊道之间又有了紧密联系。吐谷(读yù)浑,一个前后大约存在了300多年的政权,其政治中心在伏俟城,也就是今天的青海省共和县一

带。朝阳市“三燕文化”研究学者周亚利说,吐谷浑与东晋十六国时期在辽宁朝阳建立政权的前燕和后燕同根同源。3世纪末,慕容鲜卑的一支从今天的辽西地区西迁,穿越河西走廊,最终在今天的青海地区建立了政权。其疆域范围与河西走廊毗邻,其间,这支政权也曾进入河西走廊,并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几乎在吐谷浑西迁的同时,一名叫昙曜的僧人在“河西四郡”之一的武威市附近的天梯山上,带人开凿窟洞。20多年后,昙曜在今天的山西省大同市开凿了云冈石窟。又过了30多年,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在辽西走廊上的义县,东北地区唯一佛教造像石窟群——万佛寺石窟开凿。相同的凿窟技艺,相同的塑像手法,石窟文化,自西向东,一脉相承。

一条明长城连接两廊道

戈壁荒漠,巍巍雄关,尽显浩气荡荡。站在明长城西端点的嘉峪关城上,极目远眺,远处的山脉连绵起伏,雄峻壮阔;树木葱郁,古朴巍峨,尽显气势壮阔。站在明长城东端点的丹东虎山长城上,放眼望去,满眼绿色,心旷神怡,在枝叶繁茂的林间,一条“长龙”蜿蜒前行,气势恢宏。明

长城在穿过河西走廊与辽西走廊后,将甘肃的嘉峪关市与辽宁的丹东市串联起来。嘉峪关,始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虎山长城,始建于明成化五年(1469年)。西起嘉峪关,东至虎山的明长城凝聚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不屈不挠的爱国情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

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柴晓明认为,长城是文明与文化交流联系的纽带,是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并存的标志。在修筑长城所进行的人口迁移过程中,民俗和文化得以传播。同时,位于交通要道和要冲的墙体、关隘和军堡为内外族群交通、贸易提供了庇护。



青海省博物馆设有吐谷浑展区,用文物和图片展示吐谷浑政权的发展历程。图为展板上绘的《慕容氏西迁示意图》。

134年前的龙引泉碑进一步证实——我国第一条城市自来水管线建在旅顺

本报记者 郭平 文并摄



龙引泉碑复制件。

龙引泉碑是一个“安民榜”

大连博物馆的“近代大连”展区设有清代北洋水师“海军公所”模型,其对面展出一方碑刻,是策展人根据龙引泉碑制作的复制件。这个专门展区反映了龙引泉碑在我国早期城市自来水工程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龙引泉碑原碑现藏于旅顺一处遗址保护区内,汉白玉雕刻,碑高150厘米、宽50厘米、厚16厘米,正面阴刻3个魏书大字“龙引泉”,周边装饰有回形纹,背面用楷书和隶书两种字体刻15行题记,经过多位学者研究、补缀,确认共有421个字。大连博物馆社会教育服务部负责人姜伟说:“龙引泉碑题记的内容分为两部分,讲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介绍了龙引泉自来水工程的基本情况:清末建设旅顺军港,需要大量饮用水。人们打了十多眼井,都不能用。他们后来在旅顺口北边大约十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处当地人称“龙眼泉”的水源,水质优良而且水量充足,于是修建了龙引泉供水工程,将水引到港口,既保障军港用水,还可以满足当地居民生活、生产用水。第二件事讲的是立碑的意图:龙引泉供水工程建成后,当地百姓担心清政府保证百姓用水的承诺不可靠,希望他们拿出切实保障措施。于是驻旅顺的清朝官员联名发文,保证龙引泉供水工程军民共用,并刻字立龙引泉碑为证。《清实录》记载:光绪二年(1876年)清廷责成军机大臣“……整饬吏治,固结民心,均与防务相表里……果使牧令得人,闾阎安辑,自可收众志成城之效也。”龙引泉碑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竖立,

基本反映了清北洋大臣与地方军政官员“固结民心”,以实现“众志成城”愿望的具体做法。从这一点来说,龙引泉碑是一个“安民榜”。

中国最早的城市自来水工程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副研究员孙桂翠是较早关注并对龙引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学者,她曾在爱人的陪同下,打着手电筒钻进集水隧道进行调查、测量和收集资料,编写了《旅顺龙引泉:中国最早的自来水系统工程》一书。龙引泉自来水工程给实地调查的孙桂翠留下深刻印象,她说:“凿集水隧道的石头每块都修理得光滑平整,砌石与砌石之间严丝合缝,非常坚固。”据介绍,当年,清北洋大臣李鸿章考察旅顺时,认为这里非常适合泊船建埠,唯一的问题是淡水缺乏。在旅顺生存必须有淡水这个问题,早在唐玄宗时期便已经引起了重视。开元二年(714年),受唐玄宗派遣,鸿胪卿崔忻从长安前往辽东,册封靺鞨首领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返程途经旅顺时,在旅顺的黄金山派人凿了两眼井,并刻石“永为证验”。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廷再次于旅顺组建水师营,水师营驻地选址就考虑到了水源,其南面的一条龙河可以直通入海,在其东南一公里处有一个龙眼泉,此泉水质甘甜,四季涌水,水势甚旺,泉水既可供当地村民、兵营将士饮用,又可以灌溉农田、供水师战船使用。到了清末,北洋海军选取旅顺建设军港之初,也面临了淡水供应问题,如龙引泉碑所记:“各机厂、水雷营、电池及来往兵船日需食用淡水甚多。附近

一带,连年开井数十口,非水味带咸,即泉脉不旺。”这一次,他们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利用旅顺地区的天然泉水修建了中国最早的城市自来水工程,即龙引泉自来水工程。

龙引泉所在地海拔20多米,工程技术人员利用了20米落差,用管道将泉水送到港区内各处军用、民用设施里。根据李鸿章当年的《洋人代建旅顺坞澳各工折》记载,以龙引泉为源头,铺设了包括直径165毫米铸铁管在内的“自来水分管径8098米,增设大小取水水器18具”。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侵略军的随军记者龟井兹明在随军日记中惊叹:“(旅顺口)饮用水有自来水和井水,自来水是从离此地4公里多的八里庄用铁管引来的,到处有水龙头,分布在市街各处,其工程十分宏大,水质也清冽,适于饮用。”

可看作一块珍贵的“醒世碑”

关于龙引泉自来水工程的具体始建时间,争论较多。但龙引泉为我国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已经得到广泛认同,2019年,这一工程入选第二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当然这项近代中国的第一与先进无缘,恰恰是长期闭关锁国的清王朝在科学技术等领域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具体事例。面对经过工业革命、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长期沉醉于天朝大国的清王朝终于闻到了危险气息,统治阶层希望通过洋务运动来挽救危局,结果以失败告终。

对于清末旅顺发生的历史,人们都非常熟悉,清末北洋海军苦心经营的旅顺军港投入使用仅6年时间,便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日寇攻陷,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在这里蓄意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2万多名中国军民惨遭毒手。此后,日俄为争夺旅顺控制权在中国的领土上大打出手,1904年“日俄战争”中,非常熟悉旅顺情况的日寇派重兵猛攻八里庄龙眼泉北侧高地上的一个俄军土木工事,日寇称之为“龙眼北方堡垒”,占领这个高地意味着切断了龙引泉供水工程这根生命线,就会给驻扎在旅顺城里的俄军和居民供水造成极大的恐慌。史料记载,当年9月19日12时整,日寇调集了40门攻城炮,48门野炮开始炮击水管堡,庙堡和北线的其他工事。水管堡首当其冲受到最为猛烈的炮击,日寇向其倾泻了近1000发炮弹。15时许,堡上的胸墙、掩体遭到彻底破坏。日寇第一师团一部向山头发起进攻。一夜血战,日寇伤亡惨重。俄军弹药消耗殆尽……20日5时,俄军放弃该堡。此后,旅顺陷入日本侵略者40余年的殖民统治中。龙引泉及龙引泉碑就是那段悲惨历史的见证,其中龙引泉碑经历了数次推倒、重立的过程。龙引泉碑最新一次重建是在1982年。当时旅顺口区文物管理办公室的文物工作者王琳为收集龙引泉碑的内容,根据老同志的回忆,在一片水泥地面下方挖出了龙引泉碑。出土时,碑身已经残破,还破裂出十几块碎石,在经过仔细修补后,立在原地。它用亲身经历警示着后人“落后就会被动挨打”的深刻历史教训!